

<http://www.geojournals.cn/georev/ch/index.aspx>

中、美、苏《古生物学报》抽样调研纪要

顾道源 马 龙 李玉泉 许晓宏

(江汉石油学院, 湖北, 江陵)



近年来在国际古生物学界流行的新学说和新理论, 如间断平衡论, 歧序分类学和分子古生物学等, 没有一个是由中国或苏联学者提出的, 却大多数与美国学者有关系。抽样调查表明, 在研究成果的数量上, 中国和苏联也落后于美国。美、中、苏三国《古生物学报》平均每年刊出的学术论文分别为125篇, 81.5篇和70篇; 按会员人数计算, 美国每人每年发表论文0.078篇, 中国为0.033篇, 苏联因会员人数不详, 无法计算。按照透明度分类, 中、苏两国和美国的《古生物学报》分别属于准透明型和透明型。80年代以来, 中国古生物学会通过其会讯, 弥补了学报的不足, 大大地推动了学会工作, 提高了透明度。但会讯既与学报分离又局限于学会内部传阅, 尚未公开发行, 不利于争取社会各方面的支持, 不利于进行比较管理学的研究。试图通过本文, 使会员们学会借鉴国外的经验, 加强横向联系, 积极为生产服务, 为社会服务, 这在自然科学领域中具有普遍意义。

一、前 言

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化管理是提高经济效益的决定性因素, 是使我国走向新的成长阶段的主要支柱。在中华民族团结战斗,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历史进程中, 象古生物学这样的基础学科应该如何从研究方法, 管理体制以及社会效益方面进行一系列的改革, 以适应席卷全球的新技术革命的挑战和第三次文明浪潮的冲击, 这是中国基础科学的当务之急, 具有普遍的意义。

作为基础科学, 古生物学的成果不可能象开发研究和应用研究一样, 在很短的周期内转化为社会生产力, 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 它的作用是间接的、潜移默化的。因此, 古生物学很容易被忽视, 甚至被看成一门“可有可无”的学科。然而时间是无情的, 不重视基础研究, 不愿意对基础研究投资, 最终将导致开发应用研究的停滞不前, 这样的例子在中外科技史上举不胜举。中国古生物学自本世纪初以来, 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 经过几代人脚踏实地、不畏艰险的辛勤耕耘, 这块园地如今已是根深叶茂、硕果累累, 不仅拥有阵容强大、实力雄厚、门类齐全的古生物学家群, 在化石属种描述和基础理论研究方面, 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然而, 与发达国家比较, 中国古生物学的研究还存在着不少问题, 有些问题颇带普遍性, 值得社会各方面给予关注。

美国古生物学会是1909年成立的, 创刊于1929年的美国《古生物学报》由经济古生物学家和矿物学家学会与美国古生物学会联合编辑出版, 这个杂志是双月刊, 内容丰富, 图版精美, 涉及面广, 主要刊载应用古生物学、古生物形态学、古生物分类与命名等方面的研究论文。此外, 还发表古生物札记、书评及学会活动等专题报道性质的消息。崛起于本世纪初的苏联, 其古生物学会也有悠久的历史。其中心学术刊物《古生物学报》创刊于1959年, 主要刊载基本构造、分类描

述、综合研究诸方面的论文,研究面广,水平较高。中国古生物学会成立于1929年,其机关刊物《古生物学报》现在是双月刊,创刊于1953年,其前身为《中国古生物学会会志》,主要发表科研论文、研究简报、译文、书评、书讯、学会消息以及人物介绍等,也是古生物学的综合性学术刊物。

评价一个学术团体的学术水平和工作效率,有许多准则。一流科学家的数量,在国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的多寡,论文被引证的次数,开拓新领域,开发新技术等等是最直观、最有权威的标准。中、美、苏《古生物学报》各有数十年的历史,要对其中的每一期都进行调研是十分浩大的工程。三国的古生物学研究都日新月异地向发展,距今时间越远,偏离各自的现状也越大。因此,本文的抽样对象仅限于80年代前五年即1980至1984年。由于50年代大力提倡向苏联学习,中国和苏联的研究体制属于同一模式,因此,这个调研报告的重点是对比中、美古生物学研究之间的异同与优劣。

先后参加本课题的还有北京大学杨守仁教授,江汉石油学院徐论勋,李艺斌,舒干同志,邹传堂,杨国忠,余辉龙,潘启安,汪畅等同学。石油部科技司石宝珩,江汉石油学院科研处杨业舟和玉门石油局田昌炳三位同志对本文的写作给予了大力支持,谨此致谢。

二、数字与事实

1980至1984年美国《古生物学报》共刊载各类文章690篇(图1),作者为999人次,其中外国人占160人次。中国《古生物学报》共刊载各类文章389篇,作者为568人次。苏联为350篇,537人次。我国各个门类古生物研究者在人数上大大超过国外同门类的研究者,比如化石藻类的研究者全国就有近200人,但五年间我国发表论文的总数低于美国。五年间,美国各高等院校发表文章417篇,占总篇数的60.4%;614人次,占总人次数的61.5%。社会各研究机构(包括联邦地质调查局)发表文章152篇,占总篇数的22.0%;181人次,占总人次数的18.1%。各企事业单位发表文章45篇,占总篇数的5.9%;32人次,占总人次数的3.2%。外国人在美国《古生物学报》上发表文章154篇,占总篇数的22.3%;160人次,占总人次数的16.0%。其排列顺序是高等院校,外国专家,研究机构,工业企业。其中,高等院校居首位。与美国相比,中国排列顺序如下:

(1) 中国科学院:共270人次发表文章209篇,占总人次数的47.54%,占总篇数的53.72%。其中96.7%的文章又出自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2) 地矿部部属及地方科研单位:共162人次发表文章139篇,占总人次数的28.52%;占总篇数的35.73%。

(3) 高等院校:共70人次发表文章48篇,占总人次数的12.32%,占总篇数的12.3%;

(4) 其他部委:共20人次发表文章14篇,占总人次数的3.52%,占总篇数的3.6%;

(5) 学会通讯员:共44人次(包括会讯、消息等,一篇算一人次)发表文章42篇;占总篇数的10.7%;

(6) 外国专家在中国《古生物学报》上发表文章,仅两人次,两篇,且都是和中国科学院合作的论文,只占总篇数的0.4%。

苏联的情况与中国差不多。苏联科学院遥遥领先,居第一;其次是地方科研机构;位居第三的是高等院校;以后依次是工矿企业和外国学者。有些论文是高校和企业合作的,因此造成了统计数字的一些重复。

中、美、苏古生物学研究成果的分布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差异?这涉及到各自的管理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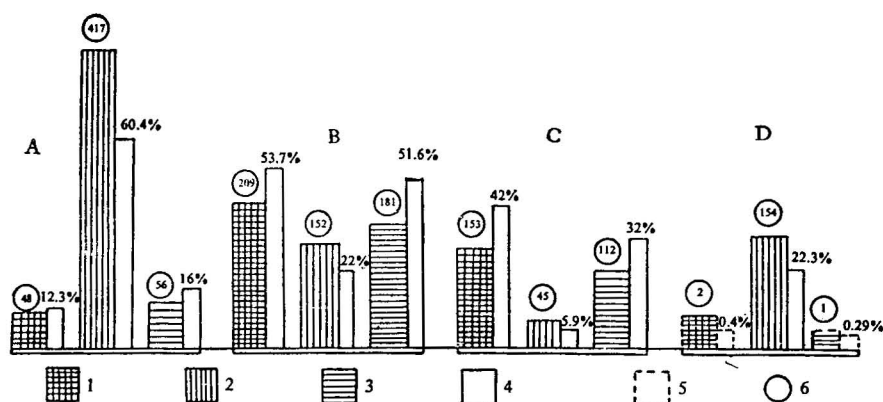


图 1 1980—1984 中、美、苏《古生物学报》高校、科研、企业论文数量比较

Eig. 1 Comparison of paper numbers among Journals of Palaeontology in PRC, USA and USSR

A. 高校 (Universities); B. 科研 (research institutions); C. 企业 (enterprises); D. 外国学者 (foreign); 1—中国 (PRC); 2—美国 (USA); 3—苏联 (USSR); 4—在本国的百分比 (proportion in a country); 5—比例夸大 (exaggerated scale); 6—论文数量 (paper numbers)。注：由于许多论文是合作的，统计数字有重复

Notes: Some paper numbers can not avoid a mere repetition because they are results cooperated)

制。以我国高等院校为例，科研能力不足是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是经费来源单一，除了国家拨款，别无他途。另外是高等院校内部的，就是领导对基础研究不够重视。再者，古生物学研究还未充分地面向社会、面向生产，和生产单位的横向联合太少，因此也就难以从社会各生产单位获得研究经费。这种状况令人忧虑，因为科学的发展，技术的进步，最终还得靠人才。高等院校古生物学研究的力量强弱、水平高低，最终必将影响到新一代古生物工作者的培养。这种状况不改变，中国古生物学的前景是不会很乐观的。实际上，人才问题不独限于各高等院校，生产单位的情况尤为严重。据石油部科技司石宝珩统计，东北扶余油田古生物学研究后继无人，只好由两位知识青年顶岗，西北玉门油田不是后继无人，而是已经无人，连一个顶在古生物岗位的知青也没有。

中、美、苏古生物学研究的另一个差距还表现在深度和广度上。美国古生物学的研究已广布世界，深入大洋，化石门类齐全，研究的时代广泛。五年中，美国古生物学家发表的论文多种多样，如分类命名、生态研究、时代分析、演化环境及生物地层学等。我国《古生物学报》上发表的论文，多系分类及时代分析，开拓型、批判型的论文较少；研究课题的主要精力集中于古生界，中、新生界研究较差。另外，我国对华东、中南、西南的研究程度较高，各占21.26%、22.26%、24.55%；西北、华北、东北研究程度较差。我国古生物学的研究如何全面平衡发展，应引起古生物学界的关注。

苏联古生物学研究也已走出本土，但仅限于越南、蒙古、阿富汗。苏联所发表的论文，主要为分类描述。这些论文研究门类齐全，研究的时代以前中生代为最多，167篇；中生代次之，125篇；新生代最差，只有35篇。美国古生物学会第70任会长Richard E. Grant(1980)曾以《人面腕足》^[1]为题，对建立过腕足动物新属的各国学者作过一个统计：美国Arthur Cooper, 422个，Arthur J. Boucot 108个。我国建新属最多的金玉杆为28个，被列为18名。中国腕足化石专家所定新属之和，未超过一个Arthur Cooper。中、美古生物学研究的差距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三、管理体制比较

科研组织的集散程度，直接影响到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科研水平的提高。过分的集中与过分的

分散都十分有害。适度的集中与适度的分散则能取长补短。一方面,集中使科研规模大、设备完善,研究人员易于专业化,研究工作比较稳定,易于深入;另一方面,权力分散,适当重复,激烈竞争,又可以产生出旺盛的科研能力来。集中的例子如美国贝尔研究所,具有60多年历史,职工总数达2万人。到80年代初,该所已获得1.9万项专利和50项重大发明,有7人获得过诺贝尔奖金。分散的例子如日本最大的企业松下电器公司,共拥有科研人员1.1万人,按分散的方式组织,成就也举世瞩目,仅专利每年就有2000件。

美国古生物学人才的绝大多数集中于各高等院校,1980年至1984年所发表的论文占美国《古生物学报》的60.4%。国家研究机构(包括联邦地质调查局)所占的比例不到25%。中、苏与之相反,古生物学人才的将近50%集中于各自的科学院,高等院校所占的比例不到25%。就1980年至1984年的统计资料看,中、美古生物人才在企业单位的比例差不多,二者发表文章的人次均约3.5%。将中、苏的情况与美国作比较,那一种组织方式更能调动积极性,更有利于古生物学的蓬勃发展?这个问题涉及到中、苏现行科研管理体制和经费的分配,最后还有人才的结构和布局等问题,值得今后作专题研究。

从图1可以看出,1980年至1984年,外国人在美国《古生物学报》上发表的研究论文为154篇,占全部论文篇数的22.3%,投稿的国家除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外,还有法国、意大利、中国、印度、挪威、日本、纳米比亚等25个国家,其研究地区遍布全球。与此同时,外国学者在苏联《古生物学报》上发表的文章仅有越南的一篇,占0.3%。苏联人跨出本土的研究仅限于蒙古、越南、阿富汗三国,合计共13篇,占3.7%。在此期间,外国学者在中国《古生物学报》上只发表了与中科院研究人员合作的两篇文章;我国学者研究国外材料的论文为零。如此强烈的对比,充分反映了我国《古生物学报》直到80年代初还是一个封闭的系统,也说明我国的古生物学家尚未冲出本土,走向世界。我们的社会正由封闭走向开放。各种新观念、新思潮、新信息正在向我们这块古老的大地输入,在我们周围繁衍。现代交通、通讯、信息处理手段的运用,拓宽了空间,缩短了时间,信息传播之广,知识更新之快,前所未有。处在这样科学大发展的前夜,古生物学研究的开放就更显得重要。

美国古生物学会由理事会管理,会长每年一选,不得连选连任,一般采取通讯选举,但投票率往往不高。学会在选举会长的同时,还选举一名候补会长、一名秘书长、一名顾问以及一名学报总编辑。候补会长见习一年后,即升任会长,所以每年选举的实际上是候补会长。1983年,在印第安纳州印第安纳波里斯召开的第75届年会,共寄出选票1440张,寄回选票479张,投票率为33%,选举结果是(J. Pojeta, 1984)^[2]会长:Walter C. Sweet;候补会长:Helen T. Loeblich;秘书长:Roger D. K. Thomas;顾问:Jennifer Kitchell;总编辑:J. John Sepkoski, Jr。选出会长后,再聘任若干拿报酬的秘书和司库来协助工作。这些秘书、司库、干事实行四年任期制。有些会长从前曾是秘书、司库或编辑,即会长不独从理事中选出。当过会长的人也可能再当秘书或司库。从50年代起,学会及其专业委员会日渐成熟。在历史悠久的太平洋分会建立很长一段时间后,70年代,另外三个分会(北美、西北、西南)也相继形成,这就更进一步地促进了会长选举的民主化。

自学会1909年成立以来至1983年,美国古生物学会先后有75位会长任职。每位会长离职时按惯例要作一次学术演讲,其演讲内容大都被郑重地刊登在《美国地质学报》或《古生物学报》上。这个传统始于第一任会长J. M. Clark。他在1909年离职时作了一次题为《古生物学会会长总结》的演讲。此后,这个活动就被流传下来,成了学会一年一度的沉闷的例会。1957年第48任会长Arthur Cooper给演讲活动带来了生机。他当选的第二年,在St. Louis召开的第50次年会上,别出心裁地举行了一次午餐会,从此,午餐会发展成了正式演讲后的一项别开生面的社交活

动。

美国古生物学会75位会长,年龄最小的43岁(42任),最大的74岁(20任)。会长的平均年龄为57.5岁。要对美国75位会长按化石专长进行分类是困难的。但是有侧重地按其主要研究门类做一统计也并非完全不可能。据统计,75位会长有21位主要从事软体动物门的研究,占28%;研究腕足动物门的位居第2,有12位占16%;第三名是脊椎动物门,有9位,占12%;研究笔石纲的最少,仅有一位,不足1.4%。这个不平衡的分布,在美国古生物学界已引起重视。第67任会长Ellis Yochelson(1983)写道,“在全部会长十个之中有九个是无脊椎动物专家的十年,布下了不满的种子……如果古生物学会确实象它宣布的那样,是一个有广泛的代表性的学术组织,学会就应该全面考虑学会人选。大古、微古、动物、植物,甚至正在研究的分类位置未定的化石都应该照顾到”^[3]。我国从1929年古生物学会成立至今,由于战争及其它原因,会长制度极不完善。笔者曾努力收集中国古生物学会会长、会员、性别、年龄、人数等基本资料,很遗憾,这些资料直至1988年夏仍是一个空白。美国古生物学会会长的传记资料曾被一再整理,学会备有会员的完整记录,委员的增减和奖励等等,在《古生物学报》上均有说明。对有特殊贡献的人还附有传记,登在“人物介绍”一栏里。显而易见,美国古生物学会组织健全,透明度高,管理完善。与美国的情形不同,长期以来我国古生物学会会长不但可以连选连任,而且形成了孙云铸—杨钟键—尹赞勋在半个世纪中三人转的“走马灯”现象。这也是干部终身制在学术管理上的一种反映。令人庆幸的是随着改革开放,这种状况现已得到改观。1984年中国古生物学会第四届理事会选出了王钰等八位名誉理事长,这对终身制的历史缺陷是一次严肃的反省,引起了各国古生物学家的高度重视。同年,理事会还通过了《关于修改会章的建议》,对原有会章进行了合理的补充和修改,以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在第四项关于选举理事长的一栏里增补了“上一届理事在新理事会内应更新1/3以上,新理事会的产生办法由各方面协商确定”等内容。在第十二条关于常务理事会增加了“理事长不能连任,但可间任,上届理事长为下届当然理事,秘书长可连选连任”等(杨遵仪,1983)。^①这对于调动会员的积极性,加强学会的民主管理,都十分有效。美国目前有各类学术团体1000多个。这些学术团体大都是科学家和工程师的群众性组织,一般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专业性较强的有美国物理学会、化学学会等,人数最多。科普性的有美国科学促进会等,几乎向所有领域的科学家开放,这类学术团体数量有限。还有一类,本身虽然是由科学家和工程师组织起来的,但兴趣不在专业方面,而是偏重于政治,这类学术团体数量也很有限。美国古生物学会属于专业性强的第一类。与人数超过10万的一些大学会如美国医学学会、美国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学会、美国科学促进会相比,拥有会员仅1600多人的美国古生物学会显得太小了。与美国其它机构庞大、各自为政的学术团体相比,美国古生物学会则堪称“小而精”。大部分美国的学术团体都吸收国外会员,但国外会员的资格有所不同。有一些学术团体,国外会员只要报名并缴纳会费便可参加,以致于这些团体国外会员的人数比国内还多,如美国物理学会等。还有一些团体,如美国地理学会,只要订购其出版物便自然成为该会会员。美国古生物学会虽然规模很小,但特别注意声誉,只选国外同行中较有资历的作为自己的国外会员,且人数还有一定的限制。因此,美国古生物学会会员素质较高。

美国古生物学会的活动经费主要来源于会员的会费、出版收入以及政府和其他方面的少量捐助。以1980年为例,美国《古生物学报》的收入款项如下^[4]:

- 1) 会员会费、对《古生物学报》的捐款和其他年收入共54 555.75美元。
- 2) 个人捐献及作者更正费等共22 880.27美元。

^① 杨遵仪:1981,中国古生物学会第三届理事会会务工作报告。中国古生物学会会讯,第16期,第9页。

3) 《化石索引》、《化石群》、《生物地层概念》及《古生物群落》的版权费共2 216.77美元。

4) 古生物学会图书馆及其他各方面的收入共12 283.43美元。

综合各项, 1980年总收入为91 936.22美元, 加上1979年以前的剩余现金78 513.78美元共170 450.00美元。到1980年12月31日止, 支出各种名目的费用后, 总结余为109 085.45美元(Sweet, 1983)。由此可见, 美国《古生物学报》的经费来源主要有两项, 一是会员费, 占48.9%; 二是各种捐助, 占34.14%, 以上两项总和占全部经费的80%左右。据统计, 差不多所有在学报上发表文章的作者, 其所在单位都向学报捐了款, 出了版面费。

我国古生物学会是按《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全国性学会组织通则》组织的专业性学术团体, 共有会员2 000多人, 比美国多近500人。其经费来源主要靠国家拨款和挂靠单位资助。1980年科协拨11 000元, 1981年拨款18 000元, 1982年拨款20 000元, 1983年拨款35 000元, 共84 000元。四年间共支出各种名目的活动经费68 438.5元, 加上从1981年起给《古生物学报》的出版亏损补贴25 539.53元, 共93 978.03元, 超出经费9 978.03元。幸而, 三年中《古生物学报》的亏损补贴皆由挂靠单位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所资助, 因此到1984年3月为止, 学会还能有15 561.50元的余资^①。

由于经费问题, 影响到学会的各种学术活动及中外之间的学术交流。在美国, 组织全国性和国际性的学术会议, 是各学术团体的重要活动方式。美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认为最有利于本国发明创造的因素之一, 就是学者在学术界最大限度的自由流动。美国的学术团体经常组织全国性和国际性的学术会议, 少则几十人, 多则数千人。这不仅对美国而且对全球科技界的影响都十分巨大。由于历史的原因, 我国古生物学会在过去的相当一段时间内是封闭的。1979年以后, 这种状况大有改观。但由于经费等方面的原因, 学术气氛还不热烈, 中外古生物研究的交流还远远不够。

经费还影响了我国《古生物学报》的编辑出版工作。1980年至1984年, 美国《古生物学报》的总页数为7 040页, 年均1 408页。我国《古生物学报》出版总页数2 942页, 年均588.4页。两者相差如此悬殊, 关键在于经费困难。据统计, 中国《古生物学报》在1984年每一万字赔本250元, 每个图版赔本90元, 仅1981年至1983年三年间, 学会总支出亏损补助25 539.53元, 据1984年《古生物学报》编辑部向学会第四届理事会作的工作报告, 1979年以前稿件积存情况比较严重。1979年全年只刊出来稿的一半。在科学出版社的大力帮助下, 继1979年改为双月刊后, 由于逐年陆续增加印张和图版数, 1980年又改排为双栏。1981年后, 当年的来稿数与刊登数之间的差距就比较小了。但由于1980年以前的稿件积存太多, 1979年45篇, 1979年以前积97篇, 共142篇, 积存稿加上当年稿一般都接近200篇。而《古生物学报》每年的刊出的稿件数仅五六十篇。稿件积存是《古生物学报》急待解决的大问题。由于稿件积存, 影响了出版周期, 减少了信息反馈量。当然, 稿件积存是无论那个国家也避免不了的, 美国在这方面情况也比较严重。从1979年10月到1980年8月1日的十个月间, 共收到论文118份, 平均每月收到稿件12份, 而从1980年至1984年五年间, 共发表论文625篇, 平均每月10篇。投稿率高于发表率, 学报发表文章有充分的挑选余地, 可以保证质量。但同时也会造成稿件积压、发稿周期过长等现象。1980至1981年我国《古生物学报》刊出周期年平均为25.62个月, 美国却只有17.6个月, 相差8.02个月。我国有篇论文的刊出周期长达5年零3个月; 刊出期最短的单篇文章刊载于1984年第二期学报上(Vol. 23, No. 2), 周期为4个月。美国最长刊出期为4年零7个半月, 最短仅两个月。在文章出版周期问题上, 苏联处理得较好, 文章刊出期最长的2年7个月, 最短的9个月。

① 陶南生, 1984, 《古生物学报》编辑部工作总结。中国古生物学会会讯, 第16期, 第21—23页。

美国《古生物学报》并不是由美国古生物学会独家经营的，美国古生物学会1909年成立后，并未办杂志，会员的论文大多发表在《美国地质学报》上。当时学会被一些既对微体化石不很关注，又对经济效益不感兴趣的研究单位所支配，由于这个原因，导致了经济古生物学家与矿物学家学会（SEPM）的建立。为了专业关系，SEPM提议创办新杂志，美国古生物学会对此表示支持。这两个学会共同办起《古生物学报》，版权归两学会联合委员会所有。对美国古生物学会来说，这是一举多得的事情，至少可以减轻学会的经济负担。编辑收到稿件，经审核并作必要的修改后，再根据当年的收入预算编排学报。同时，编辑们还常请古生物学家进行评论指导，以保证学报质量。总之，美国古生物学会对其《古生物学报》的领导工作，并不采取直接管理方式，而是按经费预算进行经济管理，间接地发挥其职能，这也是美国科学技术管理上的特点之一。

四、结 束 语

尽管我国古生物的研究与美国相比颇有差距，但并非毫无优势。我国的优势表现在不受神权的困扰。从1901年设立诺贝尔奖至1981年，全部获奖的350名科学家中，美国占了129名之多。但同一个美国，在古生物研究方面，却既是许多新理论的摇篮，又是“神创论”等伪科学的温床。生物物理化学博士Wilder-Smith教授是神创论的拥护者之一，其代表作是《自然科学对进化一窍不通》（*The Natural Science Know Nothing of Evolution*）^[5]。为了追求真理，为了不让“神创论”学派平分科学基金，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的Arther Boucot（1982）和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James A. Hopson二人合写了《科学神创论述评》^[6]。美国经济古生物学家和矿物学家协会的一位理事长R. H. Dott（1982）还专门写了社论——《科学神创论的挑战》^[7]，以坚实的论据，否定了神创论的论点，维护了科学的尊严。美国的地质学家反对神创论的斗争至今仍在继续。

国际古生物学界目前较为盛行的新学说和新理论，如间断平衡论（*Punctuated equilibria*）、新突变论（*Neocatastrophism*）、歧序分类学（*Cladistic*）、离散说（*Vicariance model*）、结构形态学（*Constructional morphology*）、等，没有一个是我国或苏联学者提出的^[8]。而这些理论对说明生物起源、演化、绝灭、生物的地理分布、生物分类系统等重大问题都起着重大的指导作用。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我国正处于改革的大潮中，完全不受神创论的干扰，引进民主管理，经费公开和竞争机制，并加以消化和改进，中国古生物学界是有希望在未来的岁月中为人类的知识宝库做出重大贡献的。

1989年4月，在武汉召开的中国古生物学会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上，王鸿祯、李星学、周明镇、郝诒纯四位教授同时当选为理事长，并规定按此顺序每人担任执行理事长一年。这一历史性的进步为在学术领域中废除终身制和官本位做出了表率，有利于科学研究的进一步改革和开放。我国的“尹赞勋奖”也正在以自己的中国特色，象美国的“Charles Schuchert奖”一样，激励中青年古生物学家们开拓、创新并为基础研究献身。80年代的实践证明，中国古生物学家正在大步向世界先进水平迈进。

考 参 文 献

- [1] Grant, R. E., 1980, The human face of the brachiopod. *Journal of Paleontology*, V. 54, No. 3, pp. 499—507.
- [2] Pojeta, J., 1984, Proceedings of the 75th annual meeting. *Journal of Paleontology*, V. 58, No. 3, p. 899.
- [3] Yochelson, E. L., 1983, 75 years of presidents and presidential address, *Journal of Paleontology*, V. 57, No. 5, pp. 1128—1134.
- [4] Sweet, W. C., 1981, Proceedings of the 72nd annual meeting, *Journal of Paleontology*, V. 55, No. pp. 704—

707.

- [5] Wilder-Smith, A. E., 1981, The natural sciences know nothing of evolution. Master Books, San Diego, California, p. 161.
- [6] Boucot, A. and Hopson, J., 1982, Sources and comments on scientific creationism. Journal of Paleontology, V. 56, No. 5, pp. 1320—1321.
- [7] Dott, R. H., 1982, The challenge of scientific creationism. Journal of Paleontology, V. 56, No. 2, pp. 267—270.
- [8] 殷鸿福, 1988, 间断平衡论及其相关思潮。《地质演化突变观》, 第36—68页, 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

SUMMARY OF SAMPLING INVESTIGATION ON JOURNAL OF PALAEONTOLOGICAL SINICA, JOURNAL OF PALEONTOLOGY (USA) AND PALEONTOLOGICAL JOURNAL (USSR)

Gu Daoyuan, Ma Long, Li Yuquan and Xu Xiaohong

(Jiangnan Petroleum College, Jiangling, Hubei)

Abstract

For the popular new paleontological theories in recent years, none of them was advanced by Chinese or Russian scholars, whereas most of them were done by Americans. This sampling investigation indicates that Chinese and Russians also lag behind Americans in quantity in publication of research papers and that the yearly published number is 125, 81.5 and 70 respectively on average. The annual paper number per head is 0.078 to Americans and 0.033 to Chinese. Owing to the lack of the membership of Russians, the paper figure has not been calculated.

According to transparency, the American journal is diaphanous and that of Chinese and Russians is translucent. Publication in America journal includes academic papers as well as complete documents like proceedings of annual meetings, presidential addresses, budgets and election results, etc. But neither Chinese nor Russians have done so.

The United States is, however, both a cradle for many new theories and a paradise for creation. Some states in U S A actually decided that middle school students must learn creation. What was more, American creationists even aggressively claimed to share the scientific funds with paleontologists. What an unimaginably queer caricature it is! Even though Russians command a vast reserve of territory and manpower, its paleontological papers, quantity and quality have not numbered that of Americans. Owing to the security system, Russians did not obey the international acknowledged code and did not use English or French abstracts for their papers. Non-Russian speakers hardly understand the activities of Russian paleontologists as well as their administration system.

With the help of the bulletin of Sinican Paleontological Association, Chinese have been remembering the defects of its journal since 1980, which has really improved its research work and the transparency of its organization system.

Nevertheless, the bulletin has not been put on sale in English internationally so that it seems unknown to the readers. The most big problem for Chinese paleontologists is the shortage of funds. They need to learn how to get financial support from the government and the society just like American paleontologists have done. So are Russian colleagues.

作者简介

顾道源，1939年出生，1961年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1965年该学院古生物学研究生毕业，长期从事古生物、地层学研究。现任江汉石油学院副教授。